

媒介城市的“日常”议题与偏向

——以 20 世纪初的广州为中心的考察

王 冰

摘 要: 日常生活是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和结构的连接处,是文化现象的基础。城市作为一种关系和环境,是媒介的表现形态。20 世纪初是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期,城市空间的剧变对城市生活变化的影响具有时代性。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州市井提供了一个从日常生活的变迁中寻找媒介城市影响现代中国历史进程隐匿偏向的独特样本。市民的主体意识伴随着社会空间发展逐渐建立,娱乐空间的开放带来了性别对立的瓦解。报刊与公园、广场、电影(剧)院、体育馆等共同组成了城市公共文化和舆论空间,并通过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形成控制,推进城市空间的生长,促进民主革命的萌发与现代社会的重新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城市不仅产生意义不同的信息,还定义人们的日常行为,从而干扰生活的偏向。

关键词: 媒介城市; 偏向; 日常; 广州

作者简介: 王冰,广东省社科联学术研究杂志社副研究员,新闻学博士(广东 广州 510635)

在现代社会,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私人化的同时,也在向公共生活开放。人们可以在公园、广场、电影(剧)院、体育馆等城市空间忘掉日常的困窘,但实际上仍然服膺于媒介城市塑造的社会体系,并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媒介城市通过不同的符号选择,使社会、娱乐、家庭和舆论空间相互交融,支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构成特定的因果关系。这是重要的社会现实(social facts)。列斐伏尔将其概括为“实践—表征—空间”的三元辩证关系^[1]。在微观层面,有非符号化的感受,也有已编码的系统,表现为最为具体的日常,并成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基础。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市井的日常,既有机地(organic)融合为同一时空下的整体,更在进程上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报刊通过传递城市的信息,完成意识形态的日常化控制。其中,不仅单一元素是考察的维度,更需关注作为媒介的城市的综合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动力所在,为克服日常生活的异化状态,恢复人的总体性生存寻找可能。

一、作为媒介的城市及其日常偏向

城市是我们赖以生存和每天都接触的现实情境,塑造着我们的日常。它不仅承载着信息,也是社会互动的渠道,在社会转型和重构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一观察构成了媒介环境理论视野的基础。美国学者麦克卢汉以环境作为特定的比喻,1967 年在《理解媒介》中提出“媒介即讯息”的命题,指出凡是能够负载信息的物质都是媒介,而不同的媒介会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产生生态式的影响。作为环境的媒介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行为,既存在逻辑上的因果,也具有时空情境的形塑。纽约学派的尼尔·波兹曼强调媒介作为一个复杂的讯息系统存在,有其隐含的固有结构,赋予文化、政治、社会和思维方式以形式,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影响。从而媒介本身成为一种具有“容器”性质的有机生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使用生物学的比喻,将媒介定义为“文化繁衍的培养皿”。城市作为我们直观可见可感知的生存媒介,不仅承载并传递着信息,还在特定的空间中形塑人的行为,由此构建新的社会关系,是媒介环境

基金项目:《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课题(2018GZY23)

学者考察的起点。日本学者佐藤卓己提出“作为媒介的城市”的命题,考察城市、媒介、人和社会的辩证关系,认为“如果说媒介具有沟通私人 and 公共的功能,那么城市就是媒介”^[3]。中国学者孙玮把城市视为媒介的理论视野,与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视野相对照,回顾了人类文明的初始状态,指出因为交流和沟通,古希腊城邦本身就是媒介^[4]。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先驱芒福德在《历史中的城市》把被传播塑造也塑造传播的城市称为“媒介的无形环境”^[5]。他们指向一个共识性的问题,城市作为一种关系和环境,是媒介的表现形态。本文延续这一思路使用“媒介城市”的理论表述。

媒介作为“环境的首要特征是隐而不显、难以察觉的”。因此波兹曼从“媒介即讯息”发展出“媒介即隐喻”的论题。媒介环境学者假定媒介在用隐蔽而强大的暗示传递信息并定义现实的过程中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它重新编织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且在塑造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人的认知时具有偏向。学者们试图回答一个共同的疑问:在特定的历史变化图景中,媒介如何作用于人类生活的改变和文化传播的差异。

实际上,媒介城市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就发生在日常生活里。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期,城市空间的剧变对城市生活变化的影响具有时代性。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州市井是一个独特的样本,它身处社会转型变革期,却充盈着人间烟火,也有万物生长;它聚精会神于日常的细枝末节,却在 20 世纪初的剧烈振荡中,通过空间的重建,赋予人们新的角色,重新定义民众和国家的关系。作为媒介的城市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怎样的偏向?怎样引起人的行为、心态的变化,进而带来人与人、人与社会及政府关系的改变?作用机制是什么?本文试图从市民日常生活的变迁中寻找城市作为媒介影响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隐匿偏向和规律。

二、日常生活的隐含结构与符号选择

虽然日常世界是人类“最重要的、最基本的”生活现实^[6],却如同黑格尔所说,“熟知者不一定真知”^[7]。日常生活是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和结构的连接处,是文化现象的基础。

20 世纪以来,日常生活作为反思科学社会的对应物,成为关注的焦点。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重述了日常语言抵抗科学语言统一意图的重要意义;胡塞尔基于对欧洲危机的深刻洞察,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指出欧洲科学的危机是长期存在于欧洲思想史上的斗争的必然结果,它的基点是“人的生活”,回归“生活世界”应作为应对策略,建立一种真正具有科学的严格性的哲学;海德格尔以一种“自在”的立场,对“日常生活”进行现代性的文化哲学批判;列斐伏尔则在《日常生活批判》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拷问任何政治与社会革命都无法代替日常生活。尽管在 20 世纪哲学领域的日常生活转向呈现出不同的倾向和趋势,但都倡导人类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8]。特别是匈牙利学者阿格妮丝·赫勒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比较研究,从微观结构上探索日常生活使社会方向发生改变的途径,其“日常生活革命”和“人类需要论”的构想,瓦解并重新定义了日常生活的边界^[9]。

传统广州的街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市民在这里讨生活,娱乐,建立社会团体,组织私人关系网络,进行“集庙议事”^[10],在街区生活中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很少受到官方的直接干涉。20 世纪初的革命激荡深刻地改变了广州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一方面,受西方影响的精英阶层试图用创造新的空间和娱乐活动,来重塑地方社区,改变城市的空间景观,创建新的文明秩序。另一方面,民众、改良精英以及政府之间也呈现出复杂的博弈状态。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媒介环境具有三个特征: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式,并从不同角度聚焦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媒介通过影响人类交往的比例和范围而改变社会的政治形式和文化形式;也提供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和认知偏向^[11]。20 世纪初的广州,弥漫在新旧交替的日常气息里。修筑街道、去除路障、拆除城墙、安装街灯等交通建设是社会生活中最显著的变化,构成城市文明的物质基础,马路、路灯和交通工具是其中代表性的符号。随着公园、体育馆、电影(剧)院的出现,娱乐空间的符号选择日益多元。报刊作为城市信息的纸质载体,与公园、广场、电影(剧)院、体育馆等共同组成了城市公共文化和舆论空间。在与读者的互动过程中,通过想象和编译,也汇集了广大市民的观点,反映市民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创刊于 1923 年的《广州民国日报》,除了阐发主义、唤醒民众等革命宣传

报道外,还记录了广州的市政建设与民生问题,展现了广州的西关筑路通车、有轨电车、三大机场、大众剧院和公园、泳场等城市新景观的出现;并最早通过副刊形式介绍思潮,引入新潮事物与生活方式,如电影、舞厅、发式和新的婚姻方式等,在呈现人们的观念表达和都市生活的同时,推进城市空间的生长,促进民主革命的萌发与现代社会的重新整合。在这个整合过程中,社会、娱乐、家庭和舆论空间相互交融,人际传播显示出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多元结构,不仅产生意义不同的信息,还定义人们的日常行为。

(一) 社会空间的发展与市民主体意识的建立

社会空间是日常生活的基础结构,首先表现为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广州第一条市内道路——长堤天字码头段(长 36.6 米)修建于 1886 年。1907 年,建成第一条市郊道路——东沙马路。政权交迭动荡,政局混乱导致中西力量割据广州,于是,这一时期,广州的建设也是分广州市和租界两部分进行。“至 1921 年,广州城区内已筑成的近代马路和街道达 17 英里,另有 75 英里马路正在修建之中。这些马路的宽度(包括人行道)约 80 英尺至 150 英尺”^[1]。民国时期城市改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拆除城墙,旧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环城路和电车。为了促进商贸和方便货物流通,拆除路障,修建马路,从 1919 年起,汽车和人力车均可在马路上自由行使,至 1921 年 11 月,开始营运公共汽车。在街道被拓宽、拉直的同时,路灯也逐渐出现在城市里,使夜间街道更加安全,夜生活的时空得以拓展,由此获得了丰富的可能。据相关研究,广州市创办于 1890 年的第一家电灯公司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配合街灯使用,部分商店还安置了私人发电机^[2]。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广州第一任警察厅厅长陈景华在安装新街灯的过程中却遇到重重阻力,遭到因为交电费而收益受损的市民抱怨^[3]。

在传统向现代过渡,旧的未去除、新的也未建立的时代转场中,普通民众表现出个人心态和社会演化之间的矛盾。现代化的进程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城市的转型在扩展了社会空间的同时,却使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空间相对缩小了。“现代化”更新了城市的面貌,转换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但这一切是以民众逐渐失去代代相传的、相对稳定的传统和生活方式为代价的”^[4]。一脸看不惯的模样下,是市民自主意识的萌生,这种意识在新型交通工具出现后演化成为一种具有监督力量的平民表达。

20 世纪初,筑路之前,广州城市的市内交通工具是马车和轿子,因为马路的拓宽,人力车、自行车和汽车在清末民初相继出现。在马路上凶猛前进时排气管冒烟的汽车,是人们眼中“横冲直撞的钢铁怪物”,因为汽车所引起的交通事故经常是致命的,人们叫它“市虎”,并把它与鸦片烟、瘟疫并称为“广州三虎”。汽车张扬的个性与广州传统文明的碰撞,一方面表现为汽车伤人的谣言传播,这些谣言源自于人力车老板和人力车夫,他们希望通过谣言来和这个新的竞争者对抗。人力车夫工会甚至专门申请减少公共汽车站。虽然汽车没有取代人力车,但它开启了车辆靠右行驶的先河。另一方面表现为报刊的负面描述。汽车在广州最初是作为奢侈生活的象征,官员或富家子弟驾车兜风取乐,横行于市,除了“市虎”,市民们还把这些私家车唤作“老虎蟹”,表达自己的不满^[5]。其中,市民爆料隐约可以看见舆论监督的雏形。“每天下班开车从惠福路回家,经常可以看到一辆黑色的摩多卡(MOTOR CAR)停于道左。其旁有小楼,非常简陋,考虑到楼里居住的人似乎不像是能够拥有这样的‘特殊阶级用品’的人,所以特别惊讶。后来了解到,原来这座小楼是一个官员‘外妇之居’,这位官员特意选择这样一处简陋居所,本来想避人耳目,金屋藏娇,但车暴露了行踪。”^[6]尽管这则刊登在副刊版的消息,未必真实,却侧面反映出有车阶级的生活备受关注。“市虎”伤人的新闻频发,报纸上基本都是汽车的负面消息,在“编辑—作者—读者”的互动中,编辑和作者利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这一虚拟空间,塑造有车阶级骄奢跋扈、行为不端的形象,甚至只凭自己的观察,便作出官员会情妇的香艳猜想。汽车成为有钱、有权阶层的“特殊阶级用品”,如此的价值判断在迎合读者心理的同时,也透露出人们在接受新事物时的复杂心态。汽车本身作为一种新兴符号,对于曾经安全、舒缓的街道的霸道占据,横冲直撞的品性,产生贫与富的社会分割,不仅激发了人们的主体意识,还从侧面展现了人们意图介入与有“车”生活相匹配的社会文明的强烈意愿,或者说是意图适应、支配现代生活的欲望。通过依靠大众媒体所建立起来的汽车负面的现代想象,传统的人们逐渐作为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的政治权利主体加入到社会政治关系中,参与公共生活,在法定范围内主动追求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勇敢地发出民间呼声。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法治观念等主体意识的建立,成为形成良性政治生态不可或缺的推动因素。

(二) 娱乐空间的开放与性别对立的瓦解

娱乐空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赫金指出在官方的、严肃的、等级森严的秩序生活之外,还有一种充满对话与娱乐、尽情狂欢的生活。家庭、娱乐与社会生活互为补充,公园成为连接三者的一个特殊符号。公园是西方近现代城市化及市民文化的产物,但不能简单地将其判定为一种西方模式。在中国,基于寺庙和庭院兴建起来的公园,带有中国特殊的意味。公园的出现打破了县署、文庙、学宫在传统空间中的霸权格局,标志着传统空间向现代空间的转换。具有一定公益性的公园给人们带来了现代娱乐休闲场所,冲击着人们对传统空间的感受和视觉,并促成了城市新型空间的生产,广场、电影(剧)院、体育馆都可视为其衍生物。

1921年10月12日,广州建立“第一公园”,即后来的人民公园。《广州民国日报》10月13日报道,“市民到者二十万人”,可见第一公园深受市民喜爱。作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地方,民国时期的第一公园在广州首屈一指,公园“绿草如茵,干高叶茂,地方亦颇整洁,空气新鲜,令人心胸为之一快”^[17]。公园为市民提供了舒适的环境,还配备娱乐和运动设施,是书画赛事、舞狮、话剧等活动的举办地,开办各种游艺会、赈灾会、慰劳会。公园如同市民日常生活展示的舞台,市民休憩、喝茶、听曲,尽情享受公园现代功能的便利和多样,市民在公园中放松自我,融入喧闹繁杂的新世界。尽管民国初年,城市精英们最初的意愿是将公园改造成政治教育场,每天都开放的城市娱乐空间却直接为广州带来了新式的社会互动关系及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女性伴随着休闲娱乐活动的开放进入了城市的新空间。“西关小姐”是传统广州女性的代名词,西关大屋二楼的闺阁与多样化的娱乐空间形成鲜明成对比。家庭空间的隔绝被娱乐生活所打破,公共设施供女性使用,女性的休闲变得丰富,女性活动的地盘也得到扩张。

网球运动在1885年前后传入中国,由外国传教士带动,流行于广州、上海等大城市。1928年12月29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准备举办女子网球比赛的消息,号召本市女子报名参加。公园内也修建了网球场以举办网球活动。据1931年12月30日《越华报》报道:“球场,体育界多趋之,拍球取乐,迹者来一女郎,黑背心,肌肤黝黑,而两目晶莹,纠值之气溢于眉宇,球术极娴,与两男对,矫健回旋,从鲜轩轻。”第一公园在1925年还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类似于时下选秀活动的“女伶选举”^[18]。看与被看所建立的关系,有别于传统的基于血缘、地缘的熟人交际。人们逐渐适应在新的公共场所中与陌生人相处,禁锢女性的偏见受到削弱,陌生男女隔绝的习俗被打破。

女性走出闺阁,走进公园,男女约会获得了新的空间。一篇名为《公园》的粤讴唱云:“君呀,你到过来,个处第一公园。唔曾到过,又怕也把花径嚟穿。虽则未得春色满园,亦都唔怕眷恋。咪话春来景象,正可以温存。”^[19]反映此女子盼望男友能与自己去新建公园,见识一下那儿的热闹。青年男女在公园中有较为亲密行为举止的报道也多次出现在《广州民国日报》中^[20]。广州青年男女公开自由恋爱逐渐成为时尚,在街道上、公园内“拍拖”彼时颇为流行。1927年登载在《广州民国日报》的一篇名为“拉与拖”的文章,将“拉”与“拖”做比照,“拉埋天窗”拉是被动的,这是旧式婚姻让人不舒服、压迫性的结合。“拖是‘时代的花’,必须要‘肃清拉派,实现拖的运动’。”广州人形象地把自由恋爱定位于这一平等的动作上,体现出市井智慧。当时社会对婚恋自由的共同关怀,形成了相同的话题与积极的态度,在报刊上产生对自由恋爱的“时代之花”的交集和议题想象,形成了现代婚姻的公众舆论,建构出一个现代性的社会图景。人们在接纳新事物的时候,被新空间所带来的开放风气影响,也在新的空间内建立了新的认同。

这种认同,一方面表现为从“西关小姐”到优生优育高效的母亲转化。公园内遍布的公共体育设施,及随后兴建的各类体育馆,成为城市的固定标志,象征了国家克服“东亚病夫”形象的决心。为实现体育强国的目的,女性身体已经与“强国保种”这一神圣目标联系在一起。20世纪初的报刊广告中,多有女子网球比赛的介绍和女运动员的照片登载。她们不仅因为体育赛场上矫健的身姿颇受追捧,生活中也成为人们追逐的明星。“女子禁革束胸”和“天乳运动”更使女性的健美从个人关注,变成关乎民族兴旺的大计。特别是“禁革妇女束胸”的议案,主要从对女性身体的伤害与影响孕育胎儿两点入手进行论证,“强种”和“强国”的功利性因素与时代的强国梦密切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表现为职业女性形象的萌生。据1921年2月的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广州女子职业首次开放。广三铁路招收女售票实习生和女查票员。”据1921年1月14日《申报》第六版报道,广三铁路局长

夏重民不顾非议,首先“雇用本省女子三十余人作为职员,四充书记,余充收票员”。稍后,广州市电话局也雇用女接线生,“今铁路局既采用女买票员,则电话局改用女司机”^[21]。在女子解放思潮的影响下,女子获得职业、经济独立已被视为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广州原有女医护人员、女教师、产业女工的数量不断增长,并出现了新兴女性职业。20 世纪 20 年代,女性悄然进入了男性垄断的职业空间:“十年前,除了教师及医生,只有少数从事卑微的不熟练的劳动,现在却已有男子职业的一小部分向女子开放了,如银行员、铁路事务员、商店的店伙以及公司的会计等,就是大学的教授里,以及官署中的官吏等,也颇有女子的事情,这都是十年以前所没有的。”^[22]可见,女性已逐渐摆脱单一的家庭身份标签,开始寻求多元的职业身份及探寻更广阔的职业空间。职业空间对女性的开放,使广州女子进一步有了职业平等的自觉与维护自身权益的意愿。1924 年 7 月,第一代电信女工谭竹山、马少芳组织革命,发起“广东电话局女司机联合会”,提出涨工资,建立工会的要求。到 10 月,成立全国第一个女话务员工会,女性在合法空间内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正如时人所言:“女子若有了独立性的职业,便有了独立的经济。经济既然独立,虽不说社交公开,自然社交公开。虽不说婚姻自由,自然会婚姻自由。”^[23]

娱乐生活的开放扩展了女性的交往范围,成为女性追求自由和平等交往的平台和基础。精英改良者和民众在这场西方文明模式涌入引起的社会变迁中,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激烈的女性身体解放运动则顺应了这股改良风潮。国家对娱乐休闲的介入,使女性关注自身成长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她们尝试从家庭空间走出,在娱乐空间中建立起自我认同,在职业空间中强化自尊,并追求自身的社会地位,拥有独立的自我与革命勇气,与改良者在推翻一切与保留传统之间摇摆不定、相互交织,延伸至革新的各个方面,也为社会的变革埋下不安的种子。然而,传统与现代已发生断裂的社会为什么仍然表现出特定的秩序?媒介城市通过不同的生活空间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后,通过什么机制使松散的互动关系再次聚合?

三、意识形态的日常化与控制的形成

在经验、常识、习俗、杂谈闲聊和衣食住行中,日常生活以其顽固的习惯性、重复性,以其普遍平常的特征被全面地组织、纳入到生产与消费的总体环节中。它过滤并隐喻着现实。“媒介即隐喻”的论题揭示了每一种媒介都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因素,表现为对社会普遍原则的主张和对思想观念的控制,尽管这种控制很难察觉。因为它通过塑造不同的社会结构,构成特定的因果关系,界定如何完成日常的任务,从而干扰生活的偏向。

(一) 通过舆论治理的空间转化约束日常交往的内容

就传统广州而言,寺庙是一个重要的活动空间,民国初期的公园、体育馆等多由寺庙和皇家园林系统改造而成。清末时期,广州街区的公共事务包括治安、房屋改造、家庭纠纷、官民冲突等突发事件大多通过集庙议事的方式处理解决,监督和治理实际上是街区自治的模式。由于新空间的植入,原先街区自治的小范围组织关系,演化为一种新型的更为松散的关系,形成新的舆论空间。一方面,公园、体育馆、电影(剧)院等成为教育、训练和强化国民意识的空间实体载体,被改造成举行集会、演说与募捐等活动的政治教育场所。作为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一个独特的空间符号,对民主革命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公众的力量与影响正在被逐渐感知。另一方面,近代报刊作为信息载体,使个人信息摆脱了人际传播的单一渠道,读报成为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民国的信息环境与客观环境也由此开始分离。大众媒体与现实空间共同作用于日常生活,在使人们的日常交往的内容和路径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在确定内容的主题。

和上文提及的公园里、街道上“拍拖”自由恋爱形式的流行相呼应的是,时人通过写信、打电话、集会、社团等多样化的交往方式扩大交际。当时报纸广告很早开始刊登有个人的消息,是个人信息公共化的开始。1902 年 6 月 26 日,中国第一则征婚广告出现在天津《大公报》上:“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要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彼时结婚、离婚、讣闻都寄予登报形式严肃化,甚至具有法律效应。人们也对这种便捷、现代又经济的手段推崇有加,认为登报是最经济的结婚法。《广州民国日报》1926 年 8 月 3 日记载:“阅本报连日所登之结婚广告,未署何益善姜桂清同后,一对新夫妇。既不用种种之旧式,复不行近来之文明式,只登一段广告,便作正式结合,可谓简捷了当,别开生面者矣。”

报纸上还出现了外国人的私人门诊、律师事务所及求职信息。在报刊上,编辑、作者和读者互不相识,而共同关注和共同话题却使他们在想象的空间里产生交集,形成了公共舆论。尽管《广州民国日报》中关于性教育、家庭婚姻、女子装束等现代问题的探讨内容繁多,如《性教育如何施教呢》《改组家庭之我见》《婚姻的考试》《夏令妇女装束谈》等,但更多的篇幅则是让给卫生、科学等现代知识普及和宣传,诸如夫妻间如何维护爱情、胎教等。讨论婚姻家庭议题时,提倡日常生活的科学化、健康化是其隐含的主题。

舆论空间的多种符号构建出一个“现代生活”的想象,在更多的社会选择和复杂的个人目的促使交往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时,划定了边界;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塑造市民的日常、构建新的文化行为,完成日常生活的教化。在当代,市民创造舆论空间的努力,更多转移到了互联网上,由此开辟的网络信息传播和言论空间,在返回现实生活时,有时会焕发出更多直接的公共意味和其他力量一起,创造出某种能表达弱势者意愿的现实空间。我们可以从日常的历史延续中捕捉到痕迹,这种主要借助传播媒介建立并借助空间符号实现的公共讨论,有可能成为今后媒介城市中一个最活跃的部分。

(二) 通过隐匿的纪律训练形成日常交往的方式和规则

规则是人们活动的规范,纪律则是对各种客观发展层次之间整体性发展关系的维护。首先表现为人们的行为习惯。有声电影进驻广州是在1930年。20世纪30年代前,影院所放影片,皆为默片,无声无乐。只在放映时,配以字幕,以之解说剧情内容,因此文化少的观众难深入理解。据1936年出版的《广州年鉴·卷八·文化》记载,影院负责人就雇请讲解员,说明影片内容,按放映次序,一一说明,慢条斯理,柔声软语,或以动听声音,或以模仿动作言语,使观众听来,靡靡动听,饶有兴趣。有声电影院和剧院对广州百姓来说是新奇玩意儿,剧院内播出的往往是默剧,或需要字幕指引或需要解说员娓娓道来。人们在漆黑的剧院里,被要求静静地坐在指定的座位上,所有人都需要面朝舞台。现代剧院“文明”秩序的新形式指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而人工控制的灯光效果也是这种纪律加强的暗示。如此这种纪律训练其实还发生在城市的方方面面。

其次,表现为公共准入纪律的介入。对于电影院、戏院、剧场、茶馆等半公共的空间,是买票才能进入的场所。这些空间的出现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通过买票的纪律强化了消费内容与形式。人们在新的空间内建立新的认同后,这地方的吸引力自然会附加到空间的价值中去,产生经济活动。针对广州人饮茶的习惯,当时的中央公园内便有泉隐公司承办茶亭营业,“以供市民娱乐”^[24]。作为近代新兴城市的新式交往方式,跳舞总是和茶会联系在一起。相对于一些恪守传统底线的政府颁布的禁舞令,广州的舞场低调而温和地悄然生长。“商人、富贵人家的子弟等社会中上层的人都喜欢到舞场洽谈生意、交际应酬,客人既可以谈天饮酒、品尝美食,还可以跳几支交际舞,娱乐消遣,打发时光”^[25]。在新的社交文化中,与天津舞场中的男士都身着西装不同,广州人交往的礼仪纪律训练并不在于舞姿或是衣着,而是在寺庙和街道等日常见面的地方被拆除后,以消费的形式,寻找新的空间聚集议事。

再次是通过城市偶像的传播完成官方意识形态向民间的传输。孙中山去世后,“中山”成为最普及和广泛的空间符号,成为全民皆知的政治象征。民国时期大量出现以“中山”命名的地名与建筑,中山大学、中山路、中山纪念堂等成为全国各地重要而普及化的空间纪念形式,以实现“孙中山”符号常规化、日常化的目的。命名即可带来特别的意义,而这种名称的意义载体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18日报道,市公安局通令各区署分署云:转政治部报告,在国民政府之下,举凡一切集会演讲等,必先向总理遗像行礼,并恭读总理遗嘱。同时认为,电影院是对一般民众最直接有效的宣传途径,是一种“通俗教育最能普及的利器”^[26]。通过影片开演前加映的“中山化”和“三民主义化”的影像符号或标语将孙中山形象及官方意识形态向民间传输,将国家力图传输的意识形态内化为日常纪律,影响集体记忆,民众在无意识形态下潜移默化地受到意识形态的隐性操控^[27]。

(三) 通过监控及干预确定日常交往的范围和道德

防范与监控是媒介城市治理的必要条件。日常生活的不同空间集中地体现着社会的秩序与道德规范。警察义不容辞地充当了父兄丈夫的代言人,好比街头君子和大众的仲裁官。他们遵循着传统道德,为家中的男人监督着上街的女人,并解决那些从私人领域扩大到公共生活的矛盾。

为了对付城市女性在空间上的进取,父权势力从倾向于用家庭空间隔绝女性转移到重点在公共场所

分别男女。传统的广州酒馆茶楼往往不允许妇女进入,清末民初警局经常发出告示劝阻女客出入酒馆茶楼,一经查出或被控告定罪,即从重罚办^[28]。明清时期的戏院、剧场是男人的天下,剧场开始接纳女性是社会风气开化的结果,但剧场内仍不得男女混坐。1905 年两广总督批准商人在广州开设戏园,从当时《章程》所见,官府警力有限,戏园更需自设缉捕所和巡捕维持治安。戏园在门廊和座位设计方面,均严守男女之防。据 1908 年 9 月 7 日《申报》记载,座位分上中下三等,桌位(前座)、头等(东西)、二等(楼上下两旁),前座是男座,女座分居两侧,观众需凭票对号入座,坐定后要查票。至民国初年,前座叫对号位,对号入座可男女同座,两旁东西及楼上两边,就分开男女座,一边男座,一边女座。另外影院在二楼的后排设立类似今日“情侣座”的隔间^[29]。女性与警察在城市空间的对抗,反映了 20 世纪初广州的新矛盾。妇女要利用城市现代的发展来增加自己的娱乐空间及户外自由,而警察则要重建中国的女德和在城市空间的秩序。

在这个时期,电影院也开始上映西洋片,通过各种现代场景演示来形成场景与观众情感之间的联系,希望对观众启蒙和教育,影响他们的政治与审美。革命派显然认识到了影片的教育意义,但是为了减少不良影响,警察执行影戏审查制度,规定所有播放的电影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1919 年 7 月 15 日《大公报》指出,那些促进教育、弘扬中华并有利于开发民智的电影应该得到提倡,而那些伤风败俗的电影则必须取缔。又据《广州民国日报》1929 年 10 月 28 日记载,是否“诱人迷信,大有宣传宗教意味;诱人肉欲,大有宣传淫猥意味;诱人叛乱,大有宣传逆偷意味”成为干预的标准。

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干预成为 20 世纪以来城市政治的主题。尽管城市空间对于女性的控制反映了警察代表的父权势力由家庭空间向娱乐空间、由个人领域向集体领域的扩张,也表现了对民族传统道德秩序的维持,但权力的争夺对象从来不局限于性别。日常从来都是权力争夺的范围。管理者对公园、街头、电影(戏)院、舞厅的加强控制,乃是因为在市政管理理念中,从未忽略通过各种媒介对国民意识的灌输和政治意识的渗透。

四、结语

媒介通过影响人的思想和观念,塑造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模式,因而成为一种能动的社会资源^[4]。现代媒介的联合对人的自由和民主产生的影响总是难以觉察,不仅操纵物质世界,还侵入了社会结构,及我们的精神世界。即便是今日,普通的有心人,都能轻易地通过微信运动,大致推算出他人的日常行为。媒介环境不仅包围我们,还栖息在我们身上^[30]。谁能躲藏? 20 世纪初的广州,或许更像一则寓言。意识形态提供一种与日常的共生关系。人们在媒介城市中传播文化,建立新的行为规范,建构新的社会关系,也依赖于日常。媒介城市的综合符号体系是市民的、公共的,也是可控的、被塑造的;既展现出其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本质联系,也反映出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基于不同视角检省后所发现的深层意义。

从不同维度的日常切入,让我们在回到媒介环境初始理论命题中的同时,从隐匿到显现,从碎片到系统重新审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日常生活,发现隐藏其中的结构化的文化传播路径和社会体系以及相互转化的可能,一种以“日常”为引导的隐匿偏向,正逐渐实现我们自己对城市与社会的认知、辨识与重建,反思各种力量的相互联系。如何还原媒介的建设性角色,打开促进人与社会全面、自由发展的广阔环境,是日常留给我们的难题,而难题的解答也潜伏在生活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这位法国尼采研究开拓者的名言,“人类的生存就是‘无动机的’庆祝生活”^[31]。

(北京微吼时代科技有限公司马莉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 [1] 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 [M]. 李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4-40.
- [2] 佐藤卓己. 现代传媒史 [M]. 诸葛蔚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4.
- [3] 孙玮. 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 [J]. 新闻大学,2012(2):41-47.
- [4] 王冰. 北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想象 [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52,36.

- [5] 阿尔弗雷德·舒茨.生活世界的结构[M]//尹树广,编.后结构·生活世界·国家(第1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243.
- [6]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0.
- [7] 衣俊卿.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J].中国社会科学,1994(6):115-127.
- [8]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197-287.
- [9] 邱捷.清末广州居民的集庙议事[J].近代史研究,2003(2):187-203.
- [10] Loris Ramos.Understanding Literac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Research in Media Ecology[J].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pring 2000,8(1):48.
- [11] 倪俊明.广州城市道路近代化的起步[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316.
- [12] 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编.近代广州[M].北京:中华书局,2003:80.
- [13] 自称是“世界罪人”的民国警察厅长[N].南方都市报,2007-2-7(A44-45).
- [14]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1870-1930[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59.
- [15] 广州市的汽车[N].广州民国日报,1926-2-1//把汽车叫“市虎”的年代.南方都市报,2006-7-31(C40-41).
- [16] 惠福路之汽车[N].广州民国日报,1927-2-22//把汽车叫“市虎”的年代.南方都市报,2006-10-10(A44-45).
- [17] 三年前的公园与三年后的公园[N].广州民国日报,1925-9-22.
- [18] 政治秀、伶人秀、世相秀,好大一个秀场[N].南方都市报,第78期·广州旧闻.
- [19] 公园[N].羊城新报,1921-10-19.
- [20] 公园之狗男女[N].广州民国日报,1924-6-5;公园中之虚惊[N].广州民国日报,1924-6-18.
- [21] 杨奉常.循道会史略[M]//刘粤生.广州基督教概况两会浸信会史略.香港浸信教会九十五周年珍藏本,1999:14.
- [22] 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1:79.
- [23] 陈文涛.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J].妇女杂志,1921,7(8).
- [24] 茶亭近讯[N].广州民国日报,1923-9-19.
- [25] 一样舞蹈,不一样的命运[N].南方都市报,2006-8-5(D08-09).
- [26] 看电影前须向“总理遗像”致敬[N].南方都市报,2006-11-30(A44-45).
- [27] 陈蕴茜.民国中山路与意识形态日常化[J].史学月刊,2007(12):108-116.
- [28] 丁粟.羊城珍档:清末民初的广州警察[N].羊城晚报,2006-3-26.
- [29] 银幕旁站着个讲解员的年代[N].南方都市报,2006-06-28(D12-13).
- [30] Haraway D.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M].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2-100.
- [31] 汪民安,等,编.尼采的幽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4.

The Proposition and Hidden Bias of “Daily Life” in the Media City

——A Study Centered on Guangzhou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ANG Bing

Abstract: Daily life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ocial activities and social systems and structures, and the basis of cultur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as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The impact of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urban space on the changes in urban life is typical of the era. In the 1920s and 1930s, Guangzhou City provided a unique sample for finding the hidden influence of the media city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from the changes of daily life.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citizens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pace. The openness of entertainment space provided a disintegration of gender opposition. As the paper carrier of informatio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ogether with parks, squares, movies (drama) and gymnasiums, make up the urban public culture and public opinion space. Through the routine control of ideology, the growth of urban space was promoted, democratic revolution was conceived, and the modern society was re-integrated. In this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media city chooses through different symbols, and the social, entertainment, family and public opinion spaces blend together to shape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constitute a specific causal relationship. It not only produces information of different meanings, but also defines people's daily behaviors, thus disturbing the bias of daily life.

Key words: media city; bias; daily life; Guangzhou City

(责任编辑:文晶)